

校内试用讲义

仅供参考

中共党史专题选辑

(二)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政治课部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1. 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历史教训……………刘继增（1）
2. 略论鄂豫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谭克绳（12）
3.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错误及其危害……………马建离（27）
4. 湘鄂西苏区斗争史概述……………梁 琴（43）
5. 关于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陈乃宣（74）
6. 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长征胜利……………蔡贤良（90）
7. 皖南事变……………蔡德祐（102）
8.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何春风（123）
9. 淮海战役……………朱福彬（132）
10. 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张宗民（148）
11.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牛连海（163）
12. 毛泽东思想初探……………牛连海（189）
13.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简介……………谌宗仁（231）

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历史教训

湖北财经学院 刘继增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以敌人的强大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失败的。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人们往往在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时，而又容易忽视另一方面。就以工人运动为例，人们在论述它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时，而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却常常缺乏应有的注意。本文试图就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及其种种表现；这种错误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理论上的原因；以及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教训的意义等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光辉而重要的一页。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革命军席卷长江流域以后，工人运动更是蓬勃的向前发展，其人数之众多、范围之广阔、斗争之激烈和发展之迅猛，不仅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工人斗争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五四时期以及党成立后中国出现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也是不可比拟的。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在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大发展的同时，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也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工人群众很快组织起来。1926年9月1日，湖南成立全省总工会，到年底召开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时，会员近四十万。就在武昌攻克的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年底，会员扩大到三十万。1927年元旦，南昌总工会成立。组织起来的工人，立即在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开展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斗争。当时，在北伐军占领的各主要城市的工人组织都有自己的阶级武装——工人纠察队，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甚至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27年1月，武汉人民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在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的领导下，以武汉国民政府为后盾，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接着九江的英租界也被收回，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中国的据点的伟大创举。随后，当北伐军进入上海郊区时，上海工人阶级在赵世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领导下，于1927年3月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上海工人阶级用自己的鲜血解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这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就是在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也是有数的一大范例。在“四·一二”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更向

深入的阶段发展。工人阶级这时已拥有数千枝枪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参加政权，在经济上要求参加企业的管理，在组织上要求集中权力于全国总工会，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支柱。

工人运动所取得的这些伟大业绩，应该大书特书，这在革命的史学工作者中，除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还存有不同意见以外，是没有什么分歧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肯定工人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却忽视了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究，反而采取了盲目为其辩护的态度。不仅如此，人们还把“左”倾的东西当作正确的加以肯定，并且以此为标准用来评判大革命的是非：凡是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或过火行为进行过批评或非难，就不管它是否批评得符合事实，也不管它是否在充分肯定工人运动的伟大功绩的前提下提出的，一概被斥之为机会主义，或被指责为跟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跑；反之，凡是对那时的“左”倾错误加以称赞或肯定，则不问它是否恰当，是否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或历史教训的吸取，一概又被认为是正确的和革命的。很明显，这种评判历史是非功过的公式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它阻碍了人们对大革命经验教训去进行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分析，使许多历史问题得不出科学的总结。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原因之一是人们长期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在主观上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如果说工人运动中存在“左”倾错误，那不是自相矛盾的吗？那不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开脱罪责吗？其实，这完全是个误解。陈独秀的错误既然集中表现在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那么当工人运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时，为什么就只会产生右的错误而不会产生“左”的错误呢？

原因之二：当时对于革命的工农运动，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都在进行恶毒的诽谤，攻击为“糟得很”，“过火”论也甚嚣尘上，如果我们现在也说工人运动中存在“左”倾错误，不是敌我不分，做了敌人的应声虫，甚或站到维护阶级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吗？人们每一念及这点，就噤若寒蝉，因而长期不敢涉及和研究这类问题。看来，敌人攻击工人运动“过火”指的是什么内容，工人运动实际发生的“左”倾错误又是什么内容，这两方面很需要作一番具体的分析，否则要划清界线，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很困难的。

原因之三就是人们受到这样一种观点的束缚：一个革命的工人运动如果说它存在着“左”的错误，那么就是对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就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了。这种观点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由陈伯达、康生寻章摘句的喧闹，随之又由林彪概括之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高论”，已经深深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当人们还没有从这种精神枷锁下解脱出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对历史的经验作出科学的探讨呢？

应该正确的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但是当群众运动发生之时应该正确的对待，就是在它成为历史上的一次事件时，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勿庸多言的。但什么样才叫做正确对待呢？

人们往往拿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作为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榜样，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工人起义的条件没有成熟。但当1871年3月，巴黎无产阶级以英勇的革命精神举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满腔热情地赞扬公社社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当公社失败以后，他又以极严肃认真的精神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马克思的这种态度，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革命者应该铭记心中的。

同时，列宁对待十月革命后所发生的世界革命风暴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榜样。他不仅对各国的革命热情的指导，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高度的赞扬，对国际共产主义中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一再教导人们警惕，而且也提出要注意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说，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哪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①所以对“左倾”错误也“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着手医治”。②

可见，正确的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要像马克思、列宁那样，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随时注意总结群众运动中创造的经验，纠正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不论是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都要耐心的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提高其觉悟，竭力指导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事后，更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的总结，以利于指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可惜，我们没有坚持用这种态度来研究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错误，以致使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至今还得不到科学的总结。刘少奇同志在谈到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说：“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③。刘少奇同志的告诫，不幸而言中，经过十年空前的大浩劫，难道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吗？

二、“左”倾错误的种种表现

对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我们再也不能用“群众运动过程中难免的现象”作遁词，阻碍对它科学的探讨了。这种“左”倾错误，不是一般的“过分”行为，而是一种严重的“左”倾倾向；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革命潮流中的几点浪花，而是在当时“至少帮助了反革命”④，在事后也对中国人运动产生过极大影响的。我们先看看它的种种表现，然后再对它产生的根源作一些探讨。

首先一个表现就是无限制的游行集会、政治罢工，使生产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不断的下降。本来，游行示威、政治罢工，作为一种斗争形式，在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提高工人觉悟方面，在动员工人群众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方面，是起过伟大作用的，如“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都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了充分的准

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34页。

②同上第256页。

③④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火线》1937年）。

备。即使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这一革命政权下，这一斗争形式的运用，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当革命在局部地区首先取得了胜利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政府下已享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为了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和支援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工人阶级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努力生产、发展生产。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处理的就很好。当北伐军打到湖北境内时，他们不怕吴佩孚的镇压而罢工，但当汉阳一被攻克后，他们就立即复工，支援北伐军。但从总的来看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频繁的集会活动，动辄数以万计的游行，工人参加生产的时间，大为减少，不能不说是生产下降的一大原因。

以武汉较大的企业纺织工厂为例，据武汉中央工人部的调查，当时纺织厂除因厂主潜逃或工潮而关闭的泰安、大丰、宝丰等家外，继续维持的有申新、裕华、第一等家。这些厂的工人群众从二七年正月到五月，集会或游行，停产就达十四次之多，每一日昼夜损失两工，这种情况加上休息日增加，病假人数激增和其它原因，使得生产普遍下降。1927年3月申新厂的生产额较1926年9月减低约30%，裕华厂在同月的生产额较1926年10月减低约30%，第一厂同月的生产额较1926年9月减低约55%，①情况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

另据当时报导，“自党军占领武汉以来，……往往至夜间十二时左右，忽闻铿铿之声，旋即有大声疾呼之声，报告翌晨何时游行及集合地点，并嘱咐不忘旗帜，呼声之后，又复继之以锣声，总之，在一月之间，游行示威几费半月之时日，故每月工人之工作，不过十四五日而已。……即以三月而论，如欢迎谭延闿到汉，响应上海罢工，孙中山二周年纪念、国际妇女纪念，三一八纪念等，游行示威之举特别繁多，只需晚间闻有铿铿铜锣，无论如何，皆非按时前往参加不可。”②这种情况，加上童子团的经常操演，纠察队的集中训练，此起彼伏的罢工风潮和各种工人会议的举行，耽误大量工时，加剧了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就是工人本身也感疲倦。甚至由疲倦而讨厌了。

其次表现为工人不断提出使企业无法承担的要求。在革命政府指导下，工人群众在从事政治斗争的同时，开展一些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的斗争，对革命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名英国记者写道：“汉口八年以来工资未加，到吴佩孚推翻之后，工人工值由每月六先令加至十四先令，这种消息自然要传布到长江下流……在国民政府博得这种革命的美名，也算有利，在革命战争中比好些坦克飞机还要重要。”③在初期，工人工资的增加还是可以的，如“织工厂的工资……国民政府未来以前，平均每日工资三角五分，现在增加至四角八分。先前女工及童工最低的工资每日一角二分，现在最低的二角，最高的本来七角五分，现在九角。”④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增加工资的要求也日益过度了。如江西省及南昌、九江市党部向武汉政府报告称：“店员加薪要求过渡，店主营业管理权未能确定”。在汉口也是“工会成立，薪资加倍，而又长支乱扯”。⑤武汉码头工人及苦力

①武汉中央工人部调查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报告书（1927年6月29日）

②《天津益世报》1927年4月5日。

③④兰孙姆：《国民革命外纪》

⑤武汉中央商民部转汉口总商会转呈各业公会意见书。 1927年6月。

甚至无限制的苛索五至十倍以上的运费或车费（转引自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另外当时许多行业和地区还规定有：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基层工会支部费用的负担；病假工资照发并加药费；若干月份发双薪等等，应该说这些规定，在工资极其低下的中国，对于保证工人最低生活是很必要的，但它同工资的过高过急的要求加在一起，就脱离了社会经济的能力，更使“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①

问题还在于，在工资过高过急要求增加的同时，而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了。以武汉的纺织厂为例：除每月平均三天的游行之外，由于病假工资照发，所以请病假工人增多，每厂都在一百人以上；工人怠工现象也不断增长②这样劳动工时就大幅度下降了。当时工会还自动减缩工作时间，有的在名义上是工作八小时，甚或十小时以上，而实际上则“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③很多工人还自由旷工，无人敢于过问，只此劳动时间的减少，就使得生产额急剧减低。

上述情况的发展，加上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政府的经济封锁，使得许多企业无法维持而倒闭，资本家关门、停业抽走资金与逃跑，物价飞涨，货物缺乏，失业工人达二十万，武汉政府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了。

工人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小企业、小商店的侵犯。工人工资的激增和工时的锐减、也同样波及小企业和小商店。当时的劳资纠纷，除外商和外国开办的企业以外，真正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只占一部分，而大部分则是店员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店员与店东的争议，危及小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④两湖的许多小商店，简直无法做生意。据武汉中央商民部根据当时调查举例称：“某织袜厂有机器数部，即由家中父子及寡媳等每日织袜维持生活，有时尚须借印子帐（按即高利贷）买纱。现在放印子帐者自知重利盘剥，已经离汉他往。而工会以此厂织袜，须用工会工人，于是厂主家人不能再作工。而工人薪金反增一层负担，以至负债累累，痛苦不堪。”⑤而且当时如果“生意萧条，本分亏折”，要倒闭也是困难的。因为要闭门就要先呈报，呈报后势须出解散费，无钱则以所存商品作抵。⑥在这种情形下，一般有资本的商人，都宁愿收盘，而不肯积极去谋生意之进展，更使武汉工商业日益衰落，如汉口商业衰落现象，与过去相比较，为一与十五之比。⑦造成这种严重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店员工会对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侵犯，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更为突出的是，当时工会都执行着一种政府机关的职能，这就使得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起来。开始是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工厂商店、强取什物、强制雇工，对待劳资纠纷，工会往往以武力解决，而不等待政府的仲裁；工会的童子团甚至在路口剪穿长衣人的长衣；随后，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工人纠察队，也“随便逮

①③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火线》1937年）

②武汉中央工人部调查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报告书。1927年6月23日。

④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

⑤⑥武汉中央商民部转武昌商民协会调查报告，1927年6月。

⑦詹大悲报告1927年6月15日。

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①“左”倾错误发展得是够严重的了。

上述工人运动中存在的种种“左”倾错误，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由于没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措施，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反而越干越利害，以致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中都发生了严重的影响，结果呢？不但在经济上加剧了危机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引起了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造成了党、工会同工人，工人纠察队与市民关系的紧张。对于工人运动中存在着的“左”倾错误，党的指导机关既没有统一的思想认识，又缺乏坚定一贯的方针去加强领导，而反革命派则利用这一点，施展阴谋诡计组织反动工会，利用它来胡作非为，大搞违法乱纪的勾当，并与上级工会对抗，推波助澜，加剧形势的恶化。

三、对原因的探讨

如同右倾错误一样，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很深的社会的、理论的和指导上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不仅处于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经常接受向无产阶级队伍中寻找出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壮大自己的队伍，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许多特性，如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政治倾向上的左右摇摆，组织生活方面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也突出的反映在工人运动中。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工人队伍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所占比例是很小的，据第四次全国劳大会的估计：“中国的工人若是有六百万人，那末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便要占四百万人”。^②实际上后者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中国产业工人是两百万左右，而城市小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则约一千二百万人。即使是产业工人也相当部分带有手工业色彩。武汉是一座号称“九省通衢”的商业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比重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党的第五次大会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就强调：“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小，必须使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完全团结在产业工人的周围，力量才能伟大”。当时武汉店员总工会成为工会组织中最强大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店员，毛泽东同志认为属于半无产阶级，^③他们同手工工厂工人一起，虽然数量很大，其经济生活也很困难，易于接受革命宣传，但他们的地位却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他们具有很多小生产者的弱点，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消极东西对他们影响也很大，当时的劳资纠纷绝大部分是他们与店主和小业主的争议，他们的斗争，使中小商人首当其冲，影响是极大的。

①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火线》1937年）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工会组织问题之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③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武汉政府的经济封锁对工人阶级队伍也发生了严重的影响，使得本来就严重存在着的失业队伍更加发展了。据五月初的调查，原先武汉就有“总共五万内外失业工人在人海的社会中波动着。”革命军发展到武汉后，首先是军阀反革命的产业停止，继之是一般反革命分子畏罪潜逃，继之是大商人的抽逃资金，加之敌人对武汉的经济封锁，结果是许多工厂的关闭，以致造成十万至十二万人的空前失业大军。^①到六月上旬，失业者又达到十四万人以上，其中得不到任何救济的有六、七万人，长久失业而无工会者五万四千人，有工会的失业工人达八万七千〇二十四人。^②应该指出的是，失业工人中产业工人的比例占很高，如仅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失业者即达六万余人，^③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找不到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从事于小贩、走私和投机，甚至被迫从事一些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说是乞丐、盗贼、流氓、娼妓与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刘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个阶层的特性时说，这是一个“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颇有革命性。但是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就又成为流寇主义与无政府思想的来源。”^④他们原有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渐渐失去了，他们的阶级性也慢慢改变了。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在长江中下游为数更为众多，在武汉，“经常的亦在万数”，^⑤他们过着流氓式生活，并在各地都有秘密的流氓组织，如湘鄂等省的“哥老会”、豫皖等省的“大刀会”等，它们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很大的影响着工人运动。当工人获得了自由，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他们往往随心所欲而无所顾忌，常常进行破坏性的行动而不计后果，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破坏性也厉害，许多严重的“左”倾错误行为，都是与他们的参与分不开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经济地位极其低下，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旦他们获得斗争的自由时，他们蕴藏在心底的愤怒的火焰，就像火山一样喷射出来；中国工人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从自身的体验中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加之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很短，还缺乏经验，工人文化程度又很低，在工人组织的内部也不习惯于民主。我们在分析中国工人运动的错误倾向时，这些都是应该充分估计到的特点。

上述武汉政府时期工人阶级的种种情况和它所处的特殊社会条件，使得那时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左”倾错误，很难纠正，而且愈发展愈严重，直至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左”倾错误的发生，还有理论上的原因，表现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面：一是硬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二是把蒋介石、汪精卫的阶级属性看死了，从而错误的判断了武汉政府的性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到武汉政府时期，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既阐明

①③《武汉失业工人概况》（《响导》第195期）

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④刘少奇：《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1942年10月10日。

⑤《武汉失业工人概况》（《响导》第195期）

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许多理论和政策，又加强了实际的援助，贡献是很大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其中错误的地方，对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发生影响的，首先就是硬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搬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也搬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虽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但是由于总的说来他们缺乏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又远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所以在指导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的错误。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在武汉政府时期，既造成了右的影响，如他们认为中国革命也象俄国革命一样，要长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等到时机成熟，再去掌握武装，武装夺取政权，结果枪杆子援助了蒋介石，实际上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造成了“左”的影响，表现在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科学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把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的一样。^①当时，“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②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和法国人多里欧都同意托派的意见，并在实际上加以执行，这就在理论上从一个方面给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以辩护，从而使其更加难以纠正了。

加剧工人运动“左”倾倾向的再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就是在阶级分析上的简单化，定型化，“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和这次革命失败后不久，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把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过程，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革命是全民族联合线的革命，这时候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阶段，是以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为标志开始的，革命中心是武汉，这时候无产阶级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已转到反革命营垒了；革命的第三阶段，就是苏维埃革命，在武汉时期，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武汉国民党变成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心。^④很明显，这种划分阶段的方法，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先是认定蒋介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他的叛变就代表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了，后又认定汪精卫代表小资产阶级，他的叛变又表明了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这种“定型化”的简单推论，给武汉时期工人运动以极其有害的影响。事情很清楚，既然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了，而中国革命“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⑤那么工人运动把民族工商业搞的倒闭，甚至对其接管和没收就完全是正确的了；既然武汉政府时期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应该向工农苏维埃推进，那么工人运动侵犯中小工商业者，使其破产，那又算得什么呢？

工人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产生和严重的发展，同共产党在指导上的问题也是分不开的。

①②《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第167页，第159页

③同上第167页。

④斯大林：《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⑤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

武汉政府时期，特别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的后期，在这一阶段，党的指导机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已发展成为机会主义错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革命日益陷入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对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就很难纠正了。有同志正是根据这点提出疑问：难道右倾机会主义指导下面会出现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乍看起来，的确是矛盾的，不好理解的，但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则，结合当时历史实际进行探讨，也还是可以搞明白的。

应该看到，当时的右倾错误，主要并不表现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党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还是很出色的。而是集中表现为陈独秀没有在革命力量到达的地方，对于旧的军阀官僚制度进行彻底的破坏。从军队来看，虽然创造了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废除了旧的军队制度，实现了军队制度方面某些革命性的变革，但对于军阀制度的破坏是很不彻底的：军官还是旧的，陈独秀对于由共产党员去直接当军官，一直持消极态度；没有用人民志愿兵制度去改造雇佣制度；在革命高潮时，拒绝大刀阔斧地去组织人民武装。总之，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从政权来看，当时几乎普遍实行的还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度”，没有由人民去直接行使权力，在基层革命势力并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政权。反革命派正是利用了革命的这些弱点，接连发动叛乱，并进而建立起反动王朝的。同时，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陈独秀不仅不敢坚定地依靠已经发动和正被组织起来的工农基本群众，向反动派勇敢的进攻，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反而在主要战线上一味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开展深入的斗争。

当时，广大的工人群众对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妥协退让的政策是不满的；对于国民党的动摇和日趋反动是仇恨的，对于接二连三发生的反革命叛乱是愤怒的，工人要求反抗，而领导加以压制，这一切使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倾向很快地加强起来了。加上当时党还不善于区分什么是工农运动中存在的真正的“过火”行为和来自反动阶级对工农运动的攻击。对前者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去说服教育，引导纠正，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反而采取了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逮捕工人；对后者则缺乏有力的驳斥和坚定的斗争方针，这就更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人们走上了另外的路途”。党和工人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张的。①

事实上，由于党的指导路线上的错误和对工人运动的放弃领导，使党和工会在革命危急时刻处于一种困难和孤立的地位。一方面党要阻止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倾向而又没有一个正确方针，使工人对党和工会的反感增加，总工会不能有效指挥各个工会，各个工会不能指挥各基层组织，致使党和工会不能有效的及时纠正工人运动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当时工人运动又都是由共产党员负责的，工人运动中严重“左”倾错误所引起的种种非难，就都加到共产党身上，这就影响了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同志说：大革命时，“群众中的‘左’倾现象与领导机关的右倾，结果使群众与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情绪被打落。”②可见，共产党没有正确的战略策略去指导工人运动，也是当时工人运动发生“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反革命在组织和发动叛乱时，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①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火线》1937年）

②刘少奇：《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1942年10月10日）

四、历史的教训

对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它的危害和影响，分析它发生的原因，总结它的教训，并不始于今日。这在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教训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面已经谈到，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从思想方法高度总结了第一个武汉时期的教训。他认为那时党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这种错误使党既不能在战略上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不能从策略上正确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加上当时把工会变为政权和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职工国际一贯的“左”倾，这些就把工人运动进一步推向“左”的极端。张闻天同志谈到在国共合作实现的条件下，改造地方政权机关时指出，用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来各别的代替政权机关，是大革命时的一个错误。^①王若飞同志也认为“当时武汉工人运动有‘左’的错误，成了经济主义偏向”。（《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43年12月）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同志在传达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精神时，谈到了统一战线，他说：

“统一战线的基本目的是认清和划分阶级敌人，使其孤立，并非是孤立自己”。而“北伐时期的统一战线对自己人乱打”^②。可见，武汉政府时期党在集中力量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方面是右倾的，而在某条战线、如工人运动这条战线上，也存在着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对自己人乱打”的“左”的错误。

顺便说一点，武汉政府时期在“四·三”事件发生后，曾发生工人打日本人窗户的“左”的幼稚行为，当时湖北省总工会曾发出布告，叫大家不要这样干。事隔二十年后，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也发生类似现象，陈毅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玻璃窗你弄坏他干什么？他是反动性吗？过去共产党失败就是这样给搞坏了的。”^③乍听起来，好像有点危言耸听，但仔细想想，所寓的革命哲理却是很深刻的。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认为不同意打窗户这一类行为就是陈独秀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④该是多么的应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啊！

1947年12月，朱德同志就职工运动中的“左”的错误给毛泽东同志写的信和毛泽东同志给信加的注，对于我们总结武汉时期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朱德同志在信中谈到：工人运动过去走错了路，工资过高，成品又坏，成本又高，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越来越远，他说“工人是革命领导阶级，而只顾改良自己生活，不顾战争，不顾大家，以致公私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简直是自杀政策。”对此，毛泽东同志加注：“不是公私兼顾，不是劳资两利，而是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

①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

②陈毅：《关于中央十二月会议基本精神的传达报告》1948年4月28日。

③同上

④见《光明日报》1980年3月17日。

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就是极大的失败。”^①这两位领导人所说的工人运动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应该说也总结了武汉政府时期的经验教训，事实上，那时工人运动由于“左”倾错误，不仅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感，就是在农民中也是有不满意情绪的，由于有时工会纠察队逮捕农民协会会员和职员，包围农民协会，使工农关系紧张，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②朱德同志说是“自杀政策”，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极大的失败”，问题都是提得相当严重的。

对于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提得最直接、最尖锐，并分析其原因，指出其严重危害的，是刘少奇同志。他在1937年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中，把这个问题，明确的作为大革命的一个历史教训提出来。他说：“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③。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刘少奇同志向中央报告，但得不到回答，在武汉请教于国际代表鲍罗廷、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和美共代表白劳德也得不到答复。人们死记教条，受错误理论束缚思想，不敢面对现实，以致给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就不承认大革命时有“左”倾错误，并且认为那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谁要批评一下那时的“左”倾错误，谁就会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者。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党的许多领导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教益，但却始终没引起人们认真的思考，以致使我们党和中国革命长期在“左”倾顽症折磨下，吃了很大的苦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周恩来同志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④因为在中国“左”右倾错误有着相同的社会的、阶级的、认识的根源，并且在历史的发展中造成了“左”是革命的，右是机会主义的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影响极深。把大革命时的“左”倾错误作为正确的东西一概肯定下来，就是造成这种观念的重要开端。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⑤只要认真地从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就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对于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现在是认真探讨和科学总结的时候了。

（1980年12月26日）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1册第219页。）

②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37年2月26日，另见1927年5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④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1948年1月11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58页。

略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华中师范学院 谭克绳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九年冬，在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决议精神指引下，鄂豫皖边区人民先后举行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商（城）南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并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三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上述三块根据地合并组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这是鄂豫皖边区党和人民智慧的产物，它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党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一、英勇的起义，艰苦的探索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民党新军阀在鄂豫皖边区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他们疯狂叫嚷：“宁可错杀一万个良民，不肯放松一个共产党”“凡满十六岁的共产党员，一律枪决。”①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仅黄安县从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可以查考的农民死者统计有八百余人，有二千余人流亡在外，被捕在押的约百余人……尤其在七里、紫云两区，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个人好人，所以来时见人就捉，捉到就用惨刑或者枪决，在其余地方则由豪绅任意指认，不需审判，不要证据口供，大都在“看你那样子就象‘拐（坏）人’一句话下面就被枪决了。”②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别山区。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过去混入党内的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变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些不坚定的共产党员，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经过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没有被敌人屠杀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初，在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黄冈、黄梅、广济、信阳、商城、固始、黄川等地先后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屠杀和进攻，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艰苦的探索着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这时期的武装起义，其中以黄麻起义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影响较深。

黄麻地区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董必武、陈谭秋出席党的“一大”回到武汉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在武汉读书的黄安、麻城两县青年学生如王秀松、王健、戴季伦、戴克敏、徐希烈、董贤钰、

余文治、蔡济璜、王宏文等先后加入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他们分别返回家乡，联合当地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到处散发传单，进行集会讲演，宣传革命思想，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一九二五年秋冬，分别成立了中共黄安和麻城两县特别支部，从此，这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就逐步开展起来。次年秋天，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农民运动猛烈开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劳农神圣”等口号，响遍了黄麻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黄、麻两县农民惩办了吴惠存、李介仁、丁枕鱼、王子历等几十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成为当时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广大贫苦农民通过农协这个权力机关，进行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黄麻两县农民推翻了地主武装，建立了数百人的农民自卫军。当时，吴焕先等在紫云区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农民武装。③这支新起的农民武装后来成为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黄麻地区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在这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王季松、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桂步蟾、曹学楷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站在惊涛骇浪，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他们更加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不放手，坚定地说：“农民协会还是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打不能安身。”④并率领着黄麻人民抵制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一支枪也没有缴出去，曾多次打击了敌人的武装进攻。

九月间，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黄麻地区。中央黄安县委立即在七里坪召开会议，郑位三等在会上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批评了一些不相信武装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错误思想，多数同志认为“我们有马列主义的真理。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援，打起了红旗，是一定能够存在下去，最后取得胜利。”“俄国的武装革命，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也决心干它十年、二十年。”⑤会议通过了贯彻“八七”会议的决议和由戴克敏起草的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并组织了新的县委会。与此同时，中共麻城县委也在邱家畈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同黄安县联合行动，共同举行武装起义。于是，从九月二十六日起，黄麻地区的农民到处集会，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不分昼夜地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形成了农民运动的新高潮，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九月暴动”。

但是，“由于两县党组织，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进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⑥不久，国民党魏益三部窜犯黄麻地区，至使斗争暂时停顿下来。

十月，中共湖北省委连续接到黄、麻秋起义行动的报告，得悉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又鉴于鄂南暴动已经失败，遂派王志仁（王静斋）、符向一（后叛变）、吴光浩、刘镇一、黄赤光等到黄麻地区，并决定建立中共鄂东特委，以便统一和加强领导黄、麻等县的武装起义。同时，省委给该地区党组织一封指示信，再次强调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和黄麻地区的工作方针。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省委指示：

“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本党的任务就在把这个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在四乡普遍的杀戮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发展土地革命宣传与鼓动，并即没收地主一切财产，并用很简单的方法，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和土地革命顺利进行，省委还要求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在这个斗争中，应极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把忠实勇敢的真正农民，加入我们的党，以党来做群众的核心，务做到这一个暴动是群众的暴动。同时在这个斗争中来训练同志，锻炼成铁一般的党员。”⑦

吴光浩、符向一、刘镇一等到达黄安县后，根据省委的决定，立即组成了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符向一任特委书记。他们吸取黄麻地区前段起义和鄂南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整顿了农民自卫军和加强群众武装。积极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时候，武装的汪精卫、唐生智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李宗仁集团，在长沙沿岸爆发了军阀混战，武汉反动当局无力顾及黄麻地区，这在客观上给武装起义造成了有利条件。

十一月初的鄂东特委在七里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会议还决定“巩固工农运动，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把握和加紧训练农民自卫军（人枪共百余），以此为主力，以黄安之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和麻城之乘马、顺河的农民为主要依靠，加紧反对豪绅地主，加强义勇队办事处的工作。动员第二高小的学生到农村去。”⑧会上产生了起义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担任正副总指挥。

七里坪会议后，党组织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区、乡宣传党的主张，率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劣绅，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深入宣传和发动，一支强大的起义队伍迅速地组织起来了，黄麻两省农民自卫军有枪三百余支，以刀矛、土枪等武装起来的农民达三万人以上。

十一月十三日，震动大别山区的黄麻起义爆发了。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农民义勇队，迅速汇集到起义指挥部所在地七里坪，组成攻城部队，于当晚浩浩荡荡地向黄安县城进发；在七里、紫云、高桥、仙居、桃花、城关等区成千上万的群众配合下，于十四日清晨攻入黄安城，活捉了伪县长和土劣数十人，缴枪三十余支，子弹九十箱。当天下午六时，起义部队暂时转回七里坪。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鄂东特委吸取了“九月暴动”的教训，随即组成了黄安县农民政府筹备处。接着，起义部队进驻黄安城，十六日，“我军很有秩序的并准备许多标语，而且组织了宣传大队，宣传大队走前，沿途向农民讲演，贴布告和标语，其主要内容为暴动杀尽土劣贪污，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农民政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等等。我军离城一、一里之地，将要进城的时候，市民群众鸣炮欢迎。我军大呼口号，声势赫赫的前进，一般市民（小商人在内）亦高呼‘拥护农民革命军’、‘拥护鄂东革命委员会’、‘拥护中国共产党’，以和之，革命空气非常高涨。”⑥

十八日，黄安县政府筹备处在城南的校场岗召开盛大集会，宣布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曹学楷任主席。颁布了以“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

立工农政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保护商业贸易，保护中小商人；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为内容的施政纲领。”^⑩曹学楷在大会上说：“过去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是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我们革命力量的强大，同时，也证明现在是劳农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⑪

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后，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举行了检阅仪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在检阅仪式大会上，潘忠汝坚定地说：“别看我们穿的是农装，拿的是‘土货’，我们这些‘土人’、‘土货’却能把那些‘广人’、‘广货’收拾掉。”他号召大家：“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县，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我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革命队伍！”^⑫

黄安县农民政府的成立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诞生，这是大别山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一连数日，黄安县的七里、紫云、桃花等区七万余人举行集会，热烈庆祝黄麻起义的胜利。黄冈、罗田、商城等县的农民也准备派代前来祝贺。^⑬

黄麻起义在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次武装起义，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进攻，鼓舞了广大革命人民的斗争。起义后，在鄂豫皖边区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是鄂豫皖边区土地革命和革命政权建立的先声。这次起义，向这个地区的人民深入宣传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创建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成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

当时，由于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对于敌人反扑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武汉反革命政府派一团兵不敢来，派两团打不进，派一师未必有。”^⑭特别是他们还不懂得革命根据地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建立在农村，因而没有主动地把领导中心和起义武装的主力转移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结果“使黄安暴动处于孤立境地。”^⑮十二月初，敌十二军教导师突然向黄安城奔袭，鄂东军与敌激战四小时，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攻破城门，我军遭受严重伤亡，王志仁，潘忠汝等光荣牺牲，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复陷敌手，^⑯起义地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然而，黄麻两县党组织和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在挫折面前悲观失望，他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中，探索着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十二月下旬，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一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等，在黄安县北乡木城寨召开会议，分析和讨论当前黄麻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我军的任务，一致认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区（即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要打出这个圈圈，把敌人牵走，以减少中心区的损失。”^⑰决定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枪转移到敌后游击。十二月二十九日，鄂东军七十二人，带着长短枪五十三支，胜利到达黄陂县木兰山地区。

鄂东军到达木兰山以后，根据湖北省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